

美国新闻学教授詹姆斯·阿伦森

# 新闻采访和写作

新闻采访和写作  
PD

内部发行

# 新闻采访和写作

美国亨特学院新闻学教授 著  
詹 姆 斯·阿 伦 森

新华通讯社对外新闻编辑部

一九八〇年三月

## 目 录

- |                   |         |
|-------------------|---------|
| 作者简介·····         | ( 1 )   |
| 前 言·····          | ( 3 )   |
| 第一讲 四项基本条件·····   | ( 5 )   |
| 第二讲 人物访问·····     | ( 22 )  |
| 第三讲 文艺报道·····     | ( 40 )  |
| 第四讲 世界性通讯社·····   | ( 59 )  |
| 第五讲 特写·····       | ( 78 )  |
| 第六讲 美国报刊的现状·····  | ( 99 )  |
| 第七讲 美国左派报刊的历史及其斗争 | ( 124 ) |
| 第八讲 漫谈新华通讯社·····  | ( 152 ) |
| 第九讲 再谈新华通讯社·····  | ( 173 ) |

## 作者简介

詹姆斯·阿伦森早年在美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后到大学任教，现任纽约市大学亨特学院新闻学教授。他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毕业后在故乡波士顿开始了记者生涯，以后又先后在纽约的三家大报社《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邮报》工作。

一九四八年，阿伦森辞去了《纽约时报》的工作，同别人一起创立了进步的《国民前卫》周报，并任该报主编直到一九六七年。《国民前卫》早在一九四九年就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在美国的全国性报刊中是第一家。另外，这家周报在若干年内连续刊载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关于中国的报道。

阿伦森教授长期注意观察美国新闻界的动向，写了四部有关美国报刊的书，包括《报刊与冷战》（一九七〇）和关于《国民前卫》周报历史的《有所保卫》（一九七八）。他也在好些国家的报刊上发表有关新闻学的文章。

他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邀请于一九七六年首次访华。在

那次以及一九七九年的访问中，均由他的夫人、艺术家格莱姆斯·米勒陪同。她生于北京，并在天津生活到十七岁。阿伦森夫妇计划合写一本书来记述他俩一九七九年在中国度过的半年生活和感受。

本书是阿伦森教授一九七九年在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英语写作专业任教时，开讲座的记录稿。这一讲座共分九讲，主要是讲新闻的采访和写作，也介绍了美国新闻界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些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看法。本着“洋为中用”的精神，我们将这一讲座的节要整理出来，内部出版，供同志们研究新闻业务时借鉴、参考。

## 前 言

一九七八年深秋，我接到邀请，要我到北京刚刚成立的新闻研究所当客座教授。这是中国对美国新闻学教授发出的第一份邀请书，我感到不胜荣幸。我任教的纽约亨特学院认为此事对亨特学院同样是一种荣誉。于是我就告假六个月，并着手准备我的中国之行。

我要给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讲授英文新闻写作。我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对中国学生怎么教新闻学？答案竟是出乎意料地简单：就用我在亨特学院用的那套老办法，只需稍作调整以适应那些对英语不那么熟悉的中国学生，同时可以肯定，我的中国学生像我的美国学生一样，对新闻写作是一无所知的。

我来中国后就按这个办法教书了，只是进而将新闻写作练习的场合从美国换到了中国。这办法非常奏效，学生们的进步是扎扎实实的。

但是，到了中国之后不久，有一件事却使我大为惊讶。几位对新闻研究所负有一定指导责任的新华通讯社的朋友对我说：“你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太短了。如果你的讲课对象只是十七个人（研究所英文新闻写作班全部人数），岂不太可惜了。我们很乐意把新华社大礼堂腾出来，请你开一个讲座，每月讲两次，届时我们将请北京各家英文刊物和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来听课。”

“会有多少人来听？”我问道。“嗯，大概二百人左右，”他们回答说。我答应了。准备这个讲座化去了我不少时间，因

为讲的内容几乎全得依据中国新闻单位提供的生疏材料。听讲的人像变魔术似地一下子从二百增加到五百。对此，我丝毫不感到遗憾，因为，这次讲座，正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最有意思的经历之一。

开始，双方都在摸对方的底：我想了解一下听讲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而他们也在仔细地端详我。我们很快就合作得相当融洽了。我直接用英语讲，不带翻译。他们也用英语提问。起初，他们显得有点拘束。后来，问题川流不息地提出来，超过了规定的讲课时间。我在讲课中讲了不少理论，但重点讲的是新闻学在中国的实践，并且尽量设法使西方新闻事业的精髓能适用于中国。

东道主要我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我做到了。同时，我相信，在为期五个月（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七月）的讲座中，我尽量使我提出的批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

这次讲座的成果就是这本小册子，它是为了那些没能来听讲的新闻记者和未来的记者们编的。但愿这本书有助于使中国的新闻工作能在实现新中国的宏伟目标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是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老朋友到中国的。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对中国的友情变得更加深厚、更加充实了，因为我通过观察以及从许多新朋友的交谈中得益非浅。

我在准备这些讲座的过程中得到了新华社对外部主任陈龙以及新华社的一位解决难题的能手李潞的不少协助和照顾。我对他们深表谢意。我也要感谢那些为这次讲座录了音的技术人员以及那些为了使这本书能在中国有更多人可以阅读而把它译成中文的翻译。

詹姆斯·阿伦森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 第一讲

# 四项基本条件

我知道不少有名望的来访者曾给你们中国新闻工作者中的许多人讲过课，并对你们工作中的过错提出了指责。他们讲的大部分是对的，我同意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意见。他们的讲话，有的我看到过，有的我打算拜读一下。如果我是个神仙，我会宽恕你们的过失。可惜我只是个凡人，所以你们还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去吸取教训——我们都得这样做。

我这样说也许是比较婉转的：在通往未来的大门已经敞开的这个历史时刻，我不想指手划脚地训导你们应该怎样去建设未来，我愿同你们一起讨论应该怎样做。如果我能参加这个行列，我将感到无上的光荣。我来中国之前，一位电视记者带着一个摄影组到我任教的亨特学院来采访我。访问结束准备广播的时候，他说：“教授，你觉得在中国要学习的东西同要教的东西一样多，这样说是否欠妥当？”“没问题”，我回答说，“我觉得你那么讲倒是很恰当的。”我的感觉正是如此。

我在中国只能待六个月，所以我必须把教和学结合起来。我先给你们讲我在教授新闻学之前做一个记者所学到的一点东



西。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办报同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办报，当然是有明显的不同的。然而，新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对这两种制度都是适用的。关于不同点，我们以后讨论。现在，我们先讨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做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我以为必须具备以下四项基本条件：

（一）知识广：通晓新闻业务，并对自己所采访的领域具有一定的知识。

（二）坚韧性：决心不断地追根索源，直到掌握一条新闻的全部事实。

（三）使命感：相信新闻记者的工作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即维护人民的权利和要求。

（四）不轻信：在你亲自进行调查之前，不要相信任何人告诉你的任何事情。

我们依次来谈这四个要求。关于这几点的前后顺序，你们的看法可能与我不同。不过，眼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记者要有广泛的知识。每一个记者都应当有从事这个行业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好奇心、理解力和采写新闻的训练。此外，记者应当知道他服务的报纸是如何工作的。有关这家报纸或他所在的通讯社（如新华社）的一些技术方面的情况，他也应有所了解。最重要的是，一个新闻记者应当充分了解他要采写的题材。

假如派一个记者去采访北京的外交部，或华盛顿的国务院，或纽约的联合国。这就要有一个不断学习和更新背景材料的过程。即是说，这个记者应当了解他经常接触的政府或机构的官员，如果他愿意的话，这种了解还应包括他们的习惯和癖好。他要了解这位官员的工作习惯及其周围的那些有影响的并

能为他提供消息的人物。他必须了解，比如说，在美国政体下的国务院（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是如何工作的，国务院内部以及各部之间的竞争，和与总统一起在白宫办公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相比，国务卿取得总统的信任达到何种程度。

到哪里去了解这些情况呢？事实上，消息的来源是无穷尽的，有印刷品，也有人。让我们把华盛顿作例子吧。

美国政府通过政府印刷局出版许多册介绍政府机构概况的本本，按部门列出官员的名字并附有简历和现在的职责。在国务院的新闻处，你可以查到美国所承认的每一个外国政府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和领事的姓名。

你只是许多国家派驻国务院的许多记者之一。你要结识你的同行们。在那里采访的代表美国各家报纸和新闻协会的美国记者中，不可避免地要有竞争。这将不是你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你是新华社的代表。你还是可以向其他记者提供一些情况的，暂且说，你是中国的代表吧。其他记者在向你提供消息的时候会向你要一点情况作为交换的。所以，不要一见到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就躲得远远的，即使你听不懂他讲的古怪英语也不要这样做。主要地还是要结识一些最优秀的美国记者，他们知道什么东西该到哪儿去找。你会发现他们之中许多人是玩世不恭的，这是由于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政府官员们的欺骗。然而他们这些人心地善良，精通业务。但我要提醒你们，他们也会对你撒谎的，所以一定要核实你听到的每一件事。

你也许会说，对于有幸被挑选到华盛顿的人来说，你讲的东西当然有用。可是，我如今是在北京而且还要在这儿待上一段时期，这些东西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答曰：同在华盛顿一样适用，只需换换人物而已。北京有美国大使馆和使馆官员。美

国记者将到这里来，而且，你们驻华盛顿的记者将发回电讯供你们处理。所以，你们必须掌握第一流的背景材料，你们对这些电讯所涉及的题材也必须有深切的了解。总之你们必须尽可能地掌握到最好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说，你掌握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电讯播发或付印之前，是你在做最后的一道编辑工作。

记者要有坚韧性。新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说它苦，是因为你要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找官员发表评论，而官僚主义的门坎又是很高的。这一点你们大概也很清楚。为了找一点新闻材料，你得翻阅冗长而枯燥的讲稿和报告。你得坐在会议厅里去听那些特别欣赏他们自己声音的人演说。

但是，这些事还非做不可。耐心和苦干往往能帮你挖掘出某个事实或矛盾，而这就很化得来了。懒汉干不了新闻工作。有的人只等着去接受人家散发的新闻公报（我们在美国把这种新闻公报形象地叫作“施舍品”），并按着它去炮制一条新闻，而对其中的事实根本不提出质疑，也根本不去思索一下真正的新闻是否在新闻公报里只字未提。这样的人也干不了新闻工作。

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新闻记者遇见官员们总要缠住他们，向他们提出种种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我知道，中国新闻界没有这种传统。我认为，而且我接触到的许多中国同行也认为，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与我在三年前访问中国时相比，中国差不多一切都在变。既然别的都能变，为什么中国的新闻业就不能变呢？中国新闻业特别应当来一个变化，因为它太重要了。

也许有人会对我说：“你不明白，社会主义制度与你们的制度不同。你们美国人主张‘对立面’新闻，即报界站在公众利益一边，把政府当作对立面。在中国，报刊是革命工作的一

部分，我们不认为党或政府是我们的对立面或潜在的敌人。”

我想我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我研究过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也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报刊既然是中国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它就应当确保革命稳步前进。

全国发行七百万份的大报《人民日报》的名称本身就支持了我的观点。如果它不是为人民说话，它是为谁说话呢？如果《人民日报》的某位搞调查研究的记者发现了坏人坏事、贪污行为、官僚主义的愚蠢作法，他难道会说：“这与我无关”吗？如果他抱这种态度，那他就是选错了职业。他不该搞新闻这一行。

我也许没有资格在这里说应当怎样处理这类报道。我觉得也许应该提请出了这种事的有关单位的官员注意。如果这样做仍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那么编辑们应该仔细协商一下然后在报纸上发表，但事先必须把事实搞准确，以免冤枉好人。如果《人民日报》目前还没有搞调查研究的记者，我热切地希望很快能有。我也希望在座的诸位记者和未来的记者就我所提出的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你们的看法。

记者要有使命感。新闻界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前面讲的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的某些方面，但我想再多说几句。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把他的工作仅仅看作是一种普通的职业，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甚至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新闻工作比许多其他职业更加激动人心，因为新闻瞬息万变，新的人物层出不穷，当记者又有机会各处走走，可以亲眼看到历史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想渲染新闻工作的浪漫色彩。

曾经有过一些很能干的记者，他们周游世界，写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有关世界大事的重要报道。后来，他们坐下来著书立

说，这些书表明他们基本上作为个人主义者在活动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将被历史遗忘。但是，另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你们是熟悉的，因为他们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他们具有我讲的那种使命感。我指的是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丝·特朗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他们的名字将永垂青史。他们献身于真理和正义的品质，贯串在他们的全部作品中。当然他们也有错误，但是谁又没有犯过错呢？他们是有缺点和毛病的凡人，但是谁又能例外呢？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愿望和决心。他们从搜集的事实中作出结论，并以此帮助他们的读者了解客观情况，以便他们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具有使命感是否意味着记者不能客观地报道呢？客观性这个字眼在美国已经用得滥透了，它往往是肤浅和不愿深入研究情况的遁词。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分析一下据说是指导美国新闻报道的所谓客观性法则吧。这条法则规定：新闻应当和社评严格区分开来。新闻就是新闻——说了些什么，谁说的，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说的。所有评论都应有出处。作者不应在新闻中表达他自己的意见。评述性的意见只应出现在社论或署名的评论中。

大概很少有人会不同意这一规定，我当然也没有异议。但实践起来则往往是另一回事。记者在取舍材料的时候就表达了他的主观意志，即是说，他们可以用某些材料而不用另外一些材料，结果就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报道，而是带有某种倾向性的了。还有，编辑可以把消息登在头版，给它以不恰当的重要位置，也可以把一条本该放在头版的消息深埋在报纸的里页——当然，这里我指的是有时一天出上九十页的美国报纸。

在一条消息中，记者可以对某人或某事加上一段描写，给

读者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偏见。有时，记者或编辑出于个人的爱憎，可以大量地引用一个人的话来强调某一观点，而对对立面的话一点也不引用。乔·麦卡锡参议员是臭名昭著的政治迫害狂、五十年代美国镇压时代的头子。人们把那个时代叫做“麦卡锡时代”。而麦卡锡的发家史就可以说明美国报界在怂恿他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迫害方面所起的作用，而美国报刊恰恰就是在客观报道的幌子底下那么干的。

首先，我不相信新闻记者有什么客观性。我宁愿用“公正”这个词。这就是说，在某一场合，记者的报道应该对各方都是公正的，尽管他本人可能是同情其中一方的。同时，如果当时的事实导致一定的结论，那么记者有责任在报道中提及这些结论。这就是解释性报道。我之所以说提及这些结论，是因为记者的职责不是作出判断。判断应由评论和社论去做。但是，记者干的是基础工作——为其他人撰写评论、社论打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工作，别人就无法作出权威性的判断。

因此，我说的使命感，就是说如果一个记者想使他的工作有点价值并符合新闻事业最优良的传统，他就必须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敏锐性。

记者不要轻信。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例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我没有在中国采访过新闻，所以对中国的官员们不能冒昧地下断语。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认为中国官员不愿向报界发表意见，做得有点过份。我看还是由你们自己对这个问题去作出结论吧。

在美国，政府官员或公司经理有好多办法去影响新闻界以及如何把新闻公诸于众。连最高一级也这么做，也可以说，最高一级尤其是这样。

举个例子。肯尼迪总统不喜欢孤家寡人呆在白宫，与外界隔绝。他经常夜晚出去拜访朋友。当然，他通常是由特工人员陪着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一个人。在他经常拜访的朋友中，有好几个新闻工作者。当他事先不打招呼而突然出现在某个知名的专栏作家或评论家的家庭晚会上时，那就是给了主人很大的面子。经过这样一次拜访之后，这个专栏作家压根儿就不会再写有损于肯尼迪总统的文章了。

约翰逊总统也曾抱怨呆在办公室里太寂寞。但他的作法是把记者请到白宫的私邸。在那里，他告诉他们一些情况，好让他们写出其他记者写不出的独家新闻。

国务卿基辛格过去经常向记者吹风。他把他们召来，在所谓非正式的会议上进行讨论。他用这种办法向记者提供消息（其他官员也照此办理），条件是不得说出消息的来源是他。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位记者由于未被邀请而感到恼火，揭露说消息是由基辛格提供的。那时基辛格就会出来否认他曾说过那样的话。对此谁也无法反驳，因为会议是秘密开的，谈话内容没有记录在案。那些参加会议的记者也不会透露基辛格就是消息的来源，因为他们害怕以后不再受到邀请，从而失掉获得重要新闻的机会。

优秀的记者从这些经验中得出一条结论，即最好不和政治家交往过密。比如说，某位政治家犯有严重的过失，这时记者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把有关这个政治家的事实真相写出来，要么以友情为重而把真相掩盖起来。对于当记者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件进退两难的事。

但是，必须把不轻信和玩世不恭区别开来。不轻信只不过是怀疑，事情没有核实之前不作结论。而玩世不恭则是什么也不相信。后一种态度对一个记者来说是致命的。

以后，我还要举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上述四大原则，同时还要补充其他一些原则。从实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还要把新华社的电讯同美联社或其他西方通讯社的电讯加以对比，把《北京周报》的文章同美国同类杂志的文章加以对比，从这些对比中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我还要谈到西方新闻事业的各个侧面，报纸和广播都要讲到。因为对你们来说，仅仅接触西方的电讯和广播是不够的。你们还应当熟悉和了解产生这些电讯的背景，写这些电讯的人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的经济情况。我感到，随着中国文化视野的扩大，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西方的新闻似乎一切都好。这是没有道理的。把任何事情看成尽善尽美都是没有道理的。还是采取现实的态度，积极的现实态度，要好一些。我也将尽力采取这种态度。

讲到这里，我想回到我前面提到的外国人对中国新闻界提出的种种批评。我特别要提到费里克斯·格林于一九七七年年中在北京发表的一些评论。在那次谈话中，格林以《北京周报》的一篇文章为例，说明了“夸张的反作用”，也就是说，把事情说过了头，就等于是打自己的耳光。格林引用了文章中的词句，并指出可以用“不夸张的替代词”即简单易懂的说法来代替它们。他所引用的词句中有“狂妄野心”（arrogant and ambitious craving）、“横冲直撞的野兽”（a wild beast running amok）、“疯狂地叫嚷”（frantically bidding）、“狂热地进行”（feverishly engaged）、“疯狂地追求”（madly pursuing）以及其他类似的词句。这些词句都是用来形容苏联领导的。我想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质量了。



## 附：问题解答

**问：**把新闻写得客观，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观点，马列主义的观点。有了正确的观点，才能作到客观。您同意吗？

**答：**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新闻工作者可能会这样说：“如果你选择了立场，那就立刻表明，你不可能客观。”话虽这样说，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有立场的，他们在自己的稿件中，总要回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表达的观点，而这部分人也许要占人类的大多数，这就很难说是客观了。然而，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是客观的。

我可以介绍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我是一九四八年创办的《国民前卫》周报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家很小的报纸，没有钱。但是，它的工作人员却是十分忠于职守，富有献身精神的。他们都反对当时美国政府推行的冷战政策。可以说，当时美国报界几乎全部是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对的不过百分之一，包括《国民前卫》周报。那时，我们的观点非常鲜明。我们反对冷战政策。我们主张，美国应当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相处。我们反对美国在世界上到处伸手，推行霸权政策。我想，我们的观点表达得不能再清楚了。我们对于自己的看法是直言不讳的。我们在自己报纸上发表的新闻中，当然包含着我们的观点。然而，我们在自己的观点的指导下，尽可能详尽地收集事实。我们就是这样用新闻这种形式反对冷战政策的；而在社论中，我们则公开讲反对它。此外，我们也经常发表反对派的观点。但是我们感到，既然美国报界全都表达赞成冷战政策